

# 乾隆年間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

劉迎勝\*

迄今為止，有關中國與亞美尼亞關係的研究集中於蒙元時期及其以前時代，特別是相對集中於前蘇聯高加索地區有關中古時代絲織品和漢文文書的考古發掘<sup>(1)</sup>、亨利·玉爾（Henry Yule）書中有關古代亞美尼亞的中國移民資料、蒙古西征、亞美尼亞貴族三帕德及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穿越內陸亞洲對蒙古的訪問<sup>(2)</sup>、及元代泉州亞美尼亞商人捐建天主教堂之事等。<sup>(3)</sup>本文擬論述筆者在里斯本國立東坡塔檔案館所藏《漢文檔》中發現的兩則清乾隆年間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的文獻，並兼及古代中國及亞美尼亞的關係。

## 漢籍中的亞美尼亞

漢文史料對成吉思汗西征時蒙古軍隊在高加索地區的活動祇有極為簡略的記載。元人王恽所撰元代名臣不憐吉歹的家傳中提到，其祖先速不台在西征時曾至太和嶺和寬定吉思海。<sup>(4)</sup>太和嶺即高加索山脈之打而班（Darband）隘道；而寬定吉思海則為裡海之突厥語名稱Kül Tengisi的音譯。在元代，許多高加索地區的東正教徒隨蒙古軍來到漢地。他們被稱阿速人，被集中編入軍隊，主要駐扎在蒙古草原與華北。因為他們來自西域，元代漢人常把西域人稱為回回人。阿速人種族與漢人不同，故被稱為“綠睛回回”<sup>(5)</sup>。但亞美尼亞的名字在元代漢文史料中沒有出現。

在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有一部漢－波斯雙語抄本，題為《回回藥方》。該善本部將此文獻斷為明代抄本。從殘存的部份可知，其原本應有36卷，約3,500頁至4,000頁，但今日祇有4卷存世。按筆者之

研究，此《回回藥方》應譯自一部波斯語醫學著作。<sup>(6)</sup>

在此書殘卷頁12記道：“又一方，能治胡思亂想，并馬里忽里牙（即是中風，心中不寧，狂言妄語癡候也）證候”：需用十九種動植物和礦物產品，其中第十六種為“金精石”，下面小字注“或哈者里，阿而馬尼地面水飛過者”。<sup>(7)</sup>《回回藥方》雖然是波斯－漢文雙語文獻，但并非所有術語均以波－漢兩種文獻寫成。《回回藥方》中因含有大量音譯非漢文詞匯，如不知其波斯語或阿拉伯語原型，通常還原十分困難。上述第十六味藥中的“哈者里”和“阿而馬尼”兩個詞之後，既無任何解釋，又未注明波斯文原形。所幸的是，我們可以根據音譯確定“哈者里”為阿拉伯語hajar“石”、“寶石”的音譯，而“阿而馬尼”則為Armani的音譯。Armani在波斯語中音為“亞美尼亞的”、“亞美尼亞人”和“亞美尼亞語”。而“阿而馬尼地面”則指亞美尼亞。據筆者所知，這是亞美尼亞這個地名在漢籍中首次出現。

\* 劉迎勝，歷史學博士，南京大學歷史系民族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雖然《回回藥方》被認為是明代抄本，但穆斯林醫藥學傳入中國卻早於此。隨蒙古軍來到漠地的回回官員、學者、商賈與宗教人士將許多波斯文、阿拉伯文書籍帶入中原。<sup>(8)</sup>元政府在各級官衙中置有回回譯史等官，負責翻譯波斯文。在元中央政府中，還設有回回湯藥院與廣惠司等，專司西域醫藥，其創始者為來自拂林的基督徒愛薛，有信奉基督教的醫生服務於其中，聶只兒為其中著名者。元駙馬慶王剛合剌曾患奇疾，諸醫束手無策。聶只兒以外科手術治癒之。<sup>(10)</sup>蒙古皇室成員患病時，亦時召基督徒醫生診治。薛迷思賢（撒馬爾罕）的基督徒名醫撒必因治癒成吉思汗四太子、元憲兵蒙哥及元世祖忽必烈之父拖雷的疾病而受封為答剌罕。<sup>(11)</sup>

元政府在北京設有一所回回國子學，即波斯語文學校。元末時回回國子學中有師生五十餘人。<sup>(12)</sup>明初，明政府遵循元代傳統，繼續以波斯語作為與內陸亞洲、西亞及其以遠地區溝通交往的工具。明永樂七年（1405），明政府在北京設立了四夷館，相當於今日之亞洲語言文字研究院，內有八館，其中包含一個回回館，即波斯語文學校。從保存至今的回回館的文獻可知，至明代中期回回館教師的波斯文水平已經大大下降。據此，《回回藥方》或譯於元代，或譯於明初，其中當以元代可能性較高。

故結論是，中國人很可能在13世紀時已知“阿而馬尼地面”（亞美尼亞）的名字。

### 亞美尼亞商人在澳門

在泉州主教、小級僧佩里格林寫於14世紀初的一封信中，提到泉州的一位亞美尼亞婦人曾協助過這些傳教士，向他們提供生活必需品，並捐贈了一所教堂。<sup>(13)</sup>人們不禁會問，這位婦人是否為古代生活於華南的唯一亞美尼亞人呢？

葡萄牙里斯本東波塔（Torre do Tombo）國立檔案館中收藏有大量從澳門移至葡京的漢文檔案，在檔案館中被編為“漢文檔”（Chapas Sinicas）。這些漢文檔中有多件檔案為雙語文獻，即以漢文寫成，澳葡方面的葡文秘書在文獻前後加有葡文題

注。筆者在這些檔案中發現了兩份與旅居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有關的文獻。這兩份文獻均為清政府地方當局“廣州澳門軍民府”為駐澳外商發出的前往廣州的關文。其第一篇文獻收於“漢文檔”縮微膠卷第二卷，其文為：

特授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府兼管順德香山二縣捕務水利，加一級，又隨帶加一級，紀錄五次，為稟乞給照事。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據該夷目稟稱，現據喇喇國住澳夷商嗎哆吐說稱，茲欲攜帶寫字小廝等上省料理貿易事務，懇乞轉懇給照前往，理合懇乞，俯准給照，使沿途盤詰有憑等情。

連開夷商嗎哆吐一名，寫字嘸嘸一名，商伙亞巴的一名，小廝嘸嘸一名，嘸嘸一名，映一名，嘸嘸一名，諾啞一名，咆嘸一名，嘸嘸一名，衣箱行李廚房傢伙雜物全等情到府。

據此，除移行沿途營汛查驗放行外，合行填照發給，為此牌。仰該夷目立將發來牌照一紙，轉發給該夷商收執，前往省城置貨。勒令一月限內齊貨回澳。該夷商往回毋得夾帶違禁物。一經回澳，將照稟繳察銷，毋違頒牌。

右牌仰夷目嘸嘸嘸准此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廿六日

軍民府行

限 日繳

其後有葡文題注：Licença de M Casa Branca pa Mathas vay a Cantao 26 de 7bro de 1792。

由此我們得知，澳葡當局為喇喇國旅居澳門外商嗎哆吐赴省城廣州辦商務事，向清廣州澳門軍民府報告，請求發給憑照。軍民府同意請求，同意頒照，以“使沿途盤詰”有據。澳葡當局向清地方當局報告的時間在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軍民府在接澳葡當局請照報告後的次日，便發出赴省執照，其辦事效率是相當高的。

這位喇喇國夷商嗎哆吐商團的外國人有：書記員（寫字）嘸嘸，當為 Jose 的音譯。合伙人一名，

名亞巴的（原文待考），伙計中有叫噉（Jose）的兩名、嘸嘸（原名待考）、映（原名待考）、啫啲（其原名稱應為 Joachim,）、咆嘯（其原名當為 Paulo, 今譯為保羅）、嚙哆呢（其原名當為 Antoni, 今譯為安多尼）。

軍民府頒照，要求沿途對該噉喇國夷商查驗放行。此外還要求嗎哆吐，在省城廣州置貨時間以一月為限，回澳時不得夾帶違禁物。回澳後，應將執照稟繳察銷。

這份葡文檔的後面葡文題注的漢譯為：“白房子（或稱“白宮”）大人為 Mathas 所發前往廣州執照，1792年9月26日。Mathas顯然就是這位夷商“嗎哆吐”的名稱的原型。“白房子”（Casa Branca）為澳葡當局對清軍民府的傳統稱呼。“白房子大人”即軍民府長官。

第二份文獻收於《漢文檔》微縮膠卷第4卷，其內容大致與上一份檔案大致相似，也是澳葡當局為噉喇國夷商嗎哆士赴廣州置辦貨物之事向軍民府報告，時間為上一份報告的次年，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二十九日。在收到澳葡當局報告的當日，軍民府隨即同意發出執照，其文如下：

特授廣州澳門海防軍民兼管順德香山縣捕務水利，加一級，又隨帶加一級，紀錄五次，韋，為乞恩批照事。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據該夷日啞嚙哆稟稱，現據噉喇國夷商嗎哆吐等說稱，前經遵例來澳居住，茲欲上省料理貿易事務，浼哆代為稟請給照上省。理合稟懇批照，俾沿途盤驗有憑等情。

連開夷商嗎哆吐一名，寫字類斯叟沙一名，若瑟一名，若亞敬一名，番孩一名，小廝方濟各一名，多瑪一名，該大諾一名，保祿一名，安多尼一名，奧斯定一名，雅進多一名，瑪諾厄爾一名，保里諾一名，烏槍三枝，劍刀三口，衣箱行李廚房家伙雜物全。據此合行填照給發，為此牌。仰該夷目立將發來牌照一紙轉發該夷商收執，前往省城投行料理貿易事務。毋得夾帶違禁貨物，并飭令該夷商事竣來澳，

將照稟繳察銷。毋違須牌。

右牌仰夷目啞嚙哆准此！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府行

限日繳

如上所述，這份檔案仍稱嗎哆吐為“噉喇國夷商”，并說他“前經遵例來澳居住”，可見他生活在澳門。這次他的商隊成員較前次略有變化，人數也有所增加：包括三名書記員（寫字），第一名為類斯叟沙，其名稱原型待考；第二名為若瑟，其原名當為 Jose（當即第一份文獻中之噉）；第三名為若亞敬，其原名當為 Joachim（即上文之啫啲）。此外還包括外國小孩一名，伙計九名：方濟各（原名當為 Francisco）、多瑪（原名待考）、該大諾（原名待考）、保祿（原名當為 Paulo, 當即第一份檔案中之咆嘯，今譯為保羅）、安多尼（原名當為 Antoni, 當即第一份檔案中之嚙哆呢）、奧斯定（原名當為 Austin）、雅進多（原名待考）、瑪諾厄爾（原名當為 Manuel）及保里諾（原名待考）。<sup>(14)</sup>

噉喇國的名稱在1730年成書的《海國聞見錄》中出現過。其文曰，印度“西之沿海，地名有二：曰蘇喇，曰網買，皆英機黎埔頭，其地俱係紅毛置買所建也。”<sup>(15)</sup>這裡的“網買”即今印度之孟買。至於“蘇喇”，此書的校注教李長傳注曰：“蘇喇（Surat），今譯蘇拉特，在印度西北海岸。1612年英人在此設商館，為英國侵略印度最早的根據地。”<sup>(16)</sup>這一勘同得到陳佳榮、謝方與陸峻嶺的支持。此外蘇喇在謝清高的《海錄》中寫作“蘇辣”<sup>(17)</sup>。

論述至今，上述兩份文獻似與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毫無關係。幸而在上述第二檔案之後亦有一簡短葡文題記：“Licença de M. Casa Branca o Armenio Mathas vay a Cantao. 1793.” 譯曰：“‘白房子大人’發出的 Armenio 嗎哆吐前往廣州的執照 1793年。”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葡文題記中嗎哆吐（Mathas）名字之前的 Armenio，它恰恰是亞美尼亞！

這條資料說明，這位嗎咭吐是一位旅居澳門的亞美尼亞商人。至於漢文檔案中兩次稱他為蘇喇國商人之事，似可解釋為，他可能從印度西岸今古吉拉特邦之地移居澳門。但葡文題記很清楚地表明，澳葡當局瞭解他是亞美尼亞人。

### 【註】

- (1) 在高加索地區出土的中國古代絲織品及漢文文書今收藏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埃爾米塔什博物館。這些文物曾在歐洲展出，見《從中國到拜占庭：聖彼得堡國立埃爾米塔什博物館所藏中古時代早期的絲織品》，巴伐利亞國立博物館與國立埃爾米塔什博物館編，慕尼黑，1996，頁102，圖片102B〈中國商人的文件〉（Von China nach Byzanz-fruehmittelalterliche Seiden aus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 St. Petersburg herausgegeben vom Bayerischen Nationalmuseum und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 Muenchen, 1996, p.102, photo 120b. "Dokumente eines chinesischen Kaufmanns"）。
- (2) 〔亞美尼亞〕乞刺可思—剛札克賽著，何高濟漢譯本《海屯行記》，中華書局，1981（J.A.Boyle: The Journey of Hel'um I, King of Little Armenia, i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64, no.9）。此漢文譯文不甚完美，英譯者的一些注釋在漢譯時被刪去。
- (3) 詳見後。
- (4) 王惲：〈兀良氏先廟碑銘〉，《秋澗先生大全集》，四都叢刊初編縮本，卷50，頁519。并見《元史》卷121，中華書局，1976年，頁2976。
- (5) 任崇岳著：《〈庚申外史〉箋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63。
- (6) 劉迎勝：〈回回藥方與中國穆斯林醫藥學〉，載《新疆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6月），頁92-105。
- (7) 《回回藥方》，北圖抄本，卷12，頁40b。
- (8) 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誌》，高榮盛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頁129-130。
- (9) 程距夫：〈拂林忠獻王碑〉，《程雪樓集》，卷4，清宣統二年陶氏涉園刻本；韓儒林師：〈愛薛之再檢討〉，《穹廬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93-108。
- (10)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9〈奇疾〉，中華書局，1980，頁109。
- (11) 梁相：〈大興國寺記〉，《至順鎮江誌》，卷9，中華書局，宋元方誌叢刊，葉八。
- (12) 劉迎勝：《宋元至清初我國外語教學史研究》，刊於《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頁112-118。
- (13) The Mongol Mission, ed. and intr. Christopher Dawson, London, 1955, pp.233-234；漢譯本道森編，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學出版社，1983，頁272。
- (14) 東坡塔《漢文檔》微縮膠卷第八卷中收藏數份有關清廣東地

方當局於嘉慶十年（1805）截獲兩名企圖從澳門潛往山西傳教的傳教士，并因此告諭澳葡當局的檔案。其中一名傳教士為大西洋國人，名若亞敬。清地方官府令澳葡當局核査清官府查獲的他們隨身夾帶的教籍，澳門通葡法兩國文字的葡人稱不識其文字。他們為意大利人。不知這位若亞敬與上述“蘇喇”國商團中的若敬是否為同一位。如是，則說明這個“蘇喇國”商團中有意大利人。上述商團中有幾位成員的名字頗似葡語名稱。

- (15)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李長傳校注，陳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p.62。
- (16) 同上書，頁65，注（2）。
- (17) 他們將蘇喇比定為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Gujarat）塔普提河（Tapti）河口處的蘇拉特（Surat），即古之蘇喇宅（Surastra）。見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頁412-413；頁1051。

### 【引用文獻】

- 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
-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李長傳校注，陳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
- 程距夫：〈拂林忠獻王碑〉，《程雪樓集》，卷4，清宣統二年陶氏涉園刻本。
- 〔英〕道森編，呂浦譯，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
- 〔亞美尼亞〕乞刺可思—剛札克賽著，何高濟譯：《海屯行記》，中華書局，1981。
- 韓儒林：〈愛薛之再檢討〉，《穹廬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93-108。
- 《回回藥方》，北圖抄本。
- 梁相：〈大興國寺記〉，《至順鎮江誌》，卷九，中華書局，宋元方誌叢刊，冊三。
- 劉迎勝：〈回回藥方與中國穆斯林醫藥學〉，載《新疆社會科學》，1990年，第3期（6月），頁92-115。
- 劉迎勝：〈宋元至清初我國外語教學史研究〉，刊於《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頁112-118。
- 任崇岳著：《〈庚申外史〉箋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九〈奇疾〉，中華書局，1980，頁109。
- 王士點、商企翁：《秘書監誌》，高榮盛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四都叢刊初編縮本。
-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Von China nach Byzanz-fruehmittelalterliche Seiden aus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 St. Petersburg, herausgegeben vom Bayerischen Nationalmuseum und der Staatlichen Ermitage, Muenchen, 1996.